

陶行知对教育之“痴”

□ 柳袁照

陶行知的“痴”贯穿于他生命的始终，贯穿于他从事教育事业的始终。

陶行知的痴心痴情，表现在他对平民教育的切实作为上。他办教育的平民立场，难能可贵，不仅在那时候有意义，到今天仍然闪烁着光芒。办教育是为了谁？办学校是为了谁？

比如他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时，定下四条培养目标：“要养成农人的身手，要养成科学家的头脑，要养成艺术家的兴味，要养成社会改造家的精神和热心。”

陶行知的痴行痴言，表现在他对“行知”理论的躬身实践上。陶行知曾两次改名，由此可以看出他教育思想的转变过程。陶行知的原名叫陶文瀾，因为欣赏、认同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，遂改名为“陶知行”。王阳明说“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”“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功夫。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”，在具体实践时，他发现王阳明

的理论需要修改一下，应当将“知”与“行”的次序颠倒过来，即“行是知之始，知是行之成”，便又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陶行知。

陶行知的“痴”，是痴迷。只要为办学，他什么都愿意做，不怕跌身价、不怕丢人、不怕出丑。读《手脑相长》一文，我发现陶行知在报纸上刊登过卖艺的广告，为了改善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，为了提高乡村教师的生活水平，他豁出去了。他卖什么艺？“水门汀文艺”。何为“水门汀”？就是水泥地。在水泥地上写字、写文，乞求别人欣赏。

陶行知的“痴”，还是痴狂。他颠覆了教育的固有模式，请木匠、捕蛇人来做老师。一次，一个孩子擅自把家长的手表拆了，家长来找老师告状，陶行知不仅不批评孩子，反而责怪家长扼杀了一个“爱迪生”。陶行知带孩子找师傅学艺，陪孩子一起去钟表店，让师傅拆装零件，小孩在一旁边看边学。这个典型案例揭示了什么叫

“生活即教育”、什么叫“社会即学校”、什么叫“教学做合一”。

陶行知的“痴”，更是痴傻。陶行知有一次得了一万元稿费，因为妹妹打理家务，日子过得艰难，所以希望哥哥能给家里留一点钱。陶行知好言好语给妹妹做工作：“我要去南京劳山脚下办晓庄师范，这钱要作为办学的经费。我们家虽穷，粗茶淡饭还能维持。中国34000万农民非但没有饭吃，更没有文化。用这钱去办学校，是为农民烧心香，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。你在家省着点用，算是帮我去办大事吧！”

陶行知是真正的教育家，是近百年来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。他的一生，是教育的一生。现在，我们提倡做教育家型的老师、校长，怎么做？就要像陶行知那样做一个痴人，像陶行知那样痴迷教育，像陶行知那样痴迷做老师、做校长。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自然就是好老师、好校长了。

因为疫情延缓开学，历史上不乏先例。1911年2月17日，天津《大公报》刊出一则启事，其中称：“谕诸生知悉：现因时疫流行，蔓延至津，中其毒者每至一家不保，势颇可畏。我堂平日虽讲卫生，然际此传染剧烈之时，所有宿舍、讲堂多人聚处，实觉有所未便。兹拟展缓至二月二十日再行开学，届时务各来堂理课勿误。此谕。”

消息的发布者，是享誉津门，由著名教育家严范孙和张伯苓创办的新式学校——南开中学。这则消息本是一则临时通知，最初张贴在学校门前的布告牌上。所以《大公报》刊登消息时，使用了《天津南开私立第一中学堂牌示》的标题。在传统中国，“谕”主要指称官方的文告，也用于上对下的指示。南开中学在文中郑重其事地使用了“谕”的字样，表明了校方对此事的极度重视。

1910年10月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由俄罗斯南部地区经中东铁路传入中国满洲里，随后以哈尔滨为集中暴发地迅速蔓延东北全境，接着席卷全中国，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。这场鼠疫被公认为是自欧洲“黑死病”之后，人类又一次大规模的瘟疫事件，仅在中国就造成了六万余人死亡。天津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，是华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，之前早已实现天津至唐山再至山海关的关内关外铁路通达，因此，天津也成为鼠疫疫情影响下的重要防疫区。

学生们遍布天津城，疫情之下，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无疑是学校管理者的第一要务。1911年2月16日，农历正月十八，春节已过，正值南开中学原定的开学日期。此时，在抗疫功臣、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的指挥下，清政府的疫情防治工作已取得可喜成果并有接近尾声的迹象，所有采取措施的防疫区，死亡人数已呈全部下降之势。但出于慎重起见，为了让学子们周知，防止上学聚集增加感染的风险，南开中学利用新旧并行的方式，先是在校门口张贴延迟开学的公告，转天又在北方最具权威的媒体《大公报》上公布了这一消息。

南开中学曾因疫情延迟开学

□ 胡荣华

文贵简短

□ 郑延国

孟子在《离娄章句下》一文中说：“博学而详说之，将以反说约也。”这话的意思是，广博地学习知识，详细地讲解，从而使别人在融会贯通之后回到简约中去。孟子的话音一落，响应者便接踵而至。

南北朝人刘勰称“文以辨洁为能，不以繁缚为巧”，宋人王构云“繁秣不如简淡”，明人祁彪佳曰“全以简练为胜”……至清代，持是论者更夥。李渔称“意则期多，字惟求少”，黄钺云“人方辞费，我一笔了”，刘大魁曰“文贵简。凡文笔老则简，意真则简，辞切则简，理当则简，味淡则简。气蕴则简，品贵则简，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。故简为文章尽境”。作为桐城文派的中流砥柱，刘大魁算是将“文贵简短”解释得淋漓尽致了。林纾则谓唐代韩愈善撰短文，多为“五六百字者，篇幅虽短，而气势腾跃，万水回环，千峰合抱，读之较读长篇文字为久，即无烦冗言耳”。

今人说法亦然。鲁迅称“短小精悍往往比长篇大著有力”，海明威云“我站着写，而且是一只脚站着写，迫使自己用尽可能简短的文字进行表达；我坐着改，而且是坐在沙发上改，方便自己从容不迫地勾掉那些多余的东西”，冰心说“我们伟大的祖国，是有写短文的文学传统的。那部包括上下数千年的《古文观止》，‘上起东周，下迄明末，共选辑文章二百二十篇’，有几篇是长的？如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，韩愈的《祭十二郎文》等等，哪一篇不是短而充满了真情实感”？钱鍾书则换了个角度来肯定“文贵简短”，他批评某些人“眼里只有长篇大论，瞧不起片言只语，甚至陶醉于数量，重视废话一吨，轻视微言一克”，而这些“微言”恰恰“说出了精辟的见解，益人神智”。以上四人的说法以及他们的实践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“文贵简短”的合理性、重要性和可行性。

正所谓：文章总是简短好，一词一句意深沉。恰似园林小而巧，万紫千红百媚生。

湖湘文化坐标

刘少奇同志纪念馆



坐落于宁乡县花明楼镇的刘少奇同志纪念馆，是刘少奇文物资料收藏研究中心和思想宣传阵地，2018年被评为“湖南文化地标”。

1980年3月，根据中央指示和湖南省委的决定，宁乡县委组织人员按历史原貌重新修复刘少奇旧居。1984年5月，成立了湖南省修建刘少奇同志故居纪念馆领导小组。1988年1月20日，刘少奇同志纪念馆主馆落成，并被评为省优良工程。11月24日，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开馆典礼暨铜像揭幕仪式在馆举行。

晓晓

也说“没词儿”

□ 李鸿理

近日在“副刊读吧”读张章先生的《没词儿》一文，提到汪曾祺先生的一件家庭趣事：汪先生上小学的孙女说，“爷爷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好，没词儿。”当时老师让抄写作家的名句名段，可她在爷爷的书中却找不到这样的句子。汪先生听完哈哈大笑，毫不介意，且觉得“没词儿”这个评价挺好。

写文章喜欢“搜词”，多是初学者的通病。其实，“没词儿”才是高境界。不少语文老师热衷于让学生摘抄积攒“好词好句”，写作文时规定：用一个成语，老师打一个对钩，积累到十个就有奖励，却鲜有深谙此中三昧的老师做出相反规定：用成语多了要打叉。因为，用成语表达观点确实很方便，但刻意用成语就少了

真意，有培养虚假文风之嫌。鼓励学生“搜词”，实为一条作文的弯路。

稚拙浅近才是孩子的语言特点，孩子用个性化的话表达，反而比用成语更有真性情。其实，孙女吐槽汪先生的文章“没词儿”即是。说白了，“好词好句”不是打紧的事，意趣与韵味才是文章的灵魂。

闲话

谈趣